

马克思主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同构分析

孟宪平*

〔摘要〕文化符号提供了认识时空的不同方式和表达问题的工具,由社会实践提供的新的叙事策略,给文化符号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都有自身的建构逻辑,其理想状态是形式上同构、表达上连贯、意义上契合。二者的同构要素包括主客体关系、价值寄托方式以及链接形式,其原初意义、指称意义、象征意义和引领意义经常随语境和环境而变化,构建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要立足于思想高度、全景高度、生活实践高度,通过融合创新来实现。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建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基础展开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都有特定的符号价值和话语指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话语体系;同构

文化符号是表征文化内涵、文化价值以及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话语体系是社会主体在生活和实践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能够表达思想取向和行为目标的语言结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探讨社会的符号和语言的生产机制,但《资本论》、《神圣家族》等著作中的“符号”术语,充分表达他们对符号的关注和对话语的重视。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一经产生就有了思想载体或意义载体功能,但由于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经常面对新的事实,二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同构形式也经常发生变化,从马克思主义视角考察文化符号和话语选择,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的基础性工作。

一、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同构逻辑

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总是共生的,文化符号在具体语境中产生,话语体系在符号演绎中变迁。按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观点,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应该是同构的。符号逻辑由事实逻辑、实践逻辑决

*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210023。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招标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上思想文化阵地的型构模式及建构方式研究”(16BKS118)、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江苏文艺评论平台建设”(2018-A03-(180)-0524)的研究成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定,话语逻辑经常通过关联性和指向性特征来体现。很多时候,人们不仅关注符号本意,更关注符号的引申意义,而在特定时空中的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经常被赋予现实含义。

1. 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同构的思想逻辑。思想理论和知识体系通常是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达的,长期的发展和创造过程中,文化符号以语言内容承载着话语的隐喻意义和价值寄托,显示出人们对时空关系和实践关联的认识和理解。设定某一符号,总希望它能够比较清晰地界定范围、表达内涵和体现特色。语言符号来自生活实践,但不是社会实践的简单归类,在理想的情况下,语符意义与话语意义应该一致,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依靠经验和实践得出的结论与依靠思维得出的话语会有不少差异。就语符产生的共性看,“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社会历史和基础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是某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创造出来,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的需要。”^①这种愿望是通过解构或建构表现出来的,解构原始意义之后建构的新的意义体系,会在原来意义上增添了新的功能。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都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环境中具有特殊含义的符号形式,这些符号不只是字面上的意义,更主要的是它的实践意蕴和指向功能,在逻辑上充分体现了意义构成与话语形式的一致性。如果话语或符号表达不当,可能会成为质疑的把柄,我们经常说的“词不达意”“望文生义”“言不及义”,都有这种现象。恩格斯曾说:“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这种通过克利盖和通过阅读有关著作而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②出现误差的原因在于符号界定的宽泛或狭窄、意义寄托的偏失或漏缺、使用场景的错位或失当,由此引起的质疑会促使人们对符号和话语进行修正,从而减少泛涉性、增强针对性。这一同构过程的思想逻辑在于:形式上,从片面到全面,从残缺到完整,从浅表到深层,从直接到含蓄,从原义到引申义;动因上,问题意识成为二者同构的主观因素,实践方式成为二者同构的客观因素;内容上,话语或符号的适当性及有效性是考量的主要方面。符号选择和话语构建中,一些人“唯恐写的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冗繁和拖沓”^③,在研究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时,逻辑范式、逻辑关联、逻辑结构、逻辑体系等是重要内容,但不能指望这些方面的发展和进路是直线推进的,其中包含着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消长状况。很多时候,官方需要的符号意义和民间使用的符号意义并不完全一致,民间形式依附官方形式是常见的现象,官方话语也会经常从民间意义中汲取营养。由于时空关系的变化,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同构的思想逻辑也在进化,但基本的要求是接近客观事实基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创造性活动,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符号世界,各阶层、各行业也充斥着不同类型的文化符号。文化模式与文化符号有密切联系,它通过文化符号展示民族活动和生活特征,“文化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受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它以比较稳定的形式反映和影响人们的生活。”^④尽管研究者对文化模式、文化符号、民族特征有不同的表征,却都是寄托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形式,在内涵上要求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达到逻辑上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具有鲜明符号意义的词汇,它在事实上和逻辑上规定了当下中国的主流叙事方式。

2. 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同构的叙事逻辑。随着符号意义的变化,语言表达也会变化。经验模式常常为符号设定前提,生活内容常常为话语提供素材,这两个方面所表达的意义时而重合、时而分离,

① 《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07页。

④ 周洪宇等:《关于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

是构成文化叙事模糊或精准的重要原因。现实生活中, 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符号体系和叙事方式, 但是, 在当代中国它们的存在、发展冲淡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要真正表达每一种文化的意义和特征, 就必须在叙事方式上实现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的合理映现, 用语汇和符号有机结合的方式体现这些文化形式的实践本质和意义结构, 进而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人的活动本质。这种叙事逻辑是不能仅仅当作纯粹的游戏规则的, 如果试图以纯粹形式做语言游戏上的变化, 那就很可能陷入符号主义和虚无主义网罗, 其明显失误在于, 只注重表象内容而忽视本质内容, 或者只看重部分内容而忽视整体内容。在叙事逻辑上, 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同构遵循一定的规则但又具有很多的灵活性, 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实践中, 苏联有一套话语体系, 中国有一套话语体系, 尽管都坚持马克思主义, 却在具体的形式上存在很多的差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话语体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所作的阐扬、褒贬、延伸, 采用了不同于经典的叙事方式。不论哪一种形式, 都希望意义和表现是同构和契合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时曾说: “把‘福音书的精神’和‘福音书的词语’分割开来, 是不信宗教的行为。国家迫使福音书使用政治词语, 即与圣灵的词语不同的词语, 这是亵渎行为, 即使从人的眼光来看不是这样, 但从国家自身的宗教眼光来看就是这样。”^①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同构的叙事逻辑, 受到主体的认识水平、认识立场、知识储备、倾注方式的影响, 受到时代环境、生活环境、心理环境的影响, 受到实践方式、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影响。拿文字在文学中的作用来说, 可以用于吟诗作赋、记述事实等, 但对统治阶级来说, 政治表述功能是第一位的。文化符号作为观念系统的转换形式, 使每一种语言文字都以独特的方式描述, 使生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的人能在学会这些语言文字时自然地接受它所表达的意义。

3. 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同构的实践逻辑。通过实践创造文化符合是一个常见的路径, 这是体现生活意义和社会认同的一种形式, 主要是借用历史人物、历史口号、社会思想、社会标志等, 使用的策略有“建构”或“解构”。不论是“建构”还是“解构”, 经过多次处理后, 文化的符号意义都会发生很大变化。从结构视角开展文化研究的重点, 就是辨明文化中类似语言的成分(符号、概念), 并理解它们组织起来的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实践中, 符号使用者会基于不同的要求而使用不同的符码。《续高僧传》上讲: “经不容易, 理借名贤, 常思品藻, 终惭水镜”, 在表达经义上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以至于文意之美, 盛极一时。但是, 在日常表达中, 却有不少“截断众流”式的思维, 又使禅宗语录充满鄙俚之气。有人说, 佛典优美, 佛录鄙俚是有道理的。因此, 符号的意义链接常常存在于鄙俗之间, 女子裹足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符号之一。出于传统的认识或者是对畸形之美的追求, 这种陋俗影响深远, 积习染成符号。“一尖生色合欢鞋”、“钿尺裁量减四分, 纤纤玉笋裹轻云”, 皆将陋俗赋予诗意。隋唐时期, 蒙古风俗之陋, 为汉人所鄙, 蒙古人视“杂坐喧湫, 上下同食, 举杯互饮, 不耻残秽”为豪爽慷慨, 汉人则认为齷齪不洁, 这是由于对行为符号的理解不同。然而, 马可波罗对元代物事却大为赞叹, 草昧之风亦被视佳境, 此中原因, 柳诒徵先生认为: “当时汉族文教制度远轶鞑靼, 故深恶其野蛮; 欧洲文教制度不及中国, 故大惊其宏伟。”^②上述方面对我们今天的话语选择和符号构建具有借鉴意义, 对于我们认识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粗鄙化现象也有很多启示。

话语具有差异性特征, 自然事实就是话语事实, 而在生活中不存在独立的自然事实, 话语内涵与场景存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拉克劳和墨菲都认为,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话语归结为唯心主义代名词, 文化符号具有它有明确的对象关怀, 它所表征的话语体系是具有明确目标的整体, 仅从字面上看待语言或言说, 是难以把握其中的辩证精神的。对这种观点要客观分析, 他们看到了西方社会变化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35页。

^②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 第663页。

造成的局部表象,却忽视了这种表象背后的实质,并以这种偏见为前提得出马克思主义失去活力的结论。符号又是历史地生成和传承的,那些积淀下来的传统和知识经常在现实需要和活动中再现出来,它有时被照搬下来,有时改头换面,有时补充新内容。不管是继承还是革新,都或多或少地存留着旧时代的符号遗迹,以至于在人们生活的现实中经常保存着怀旧情绪与乡愁。这一思维看到了文化符号变化的深层次问题,但也存在着悲观意识,似乎在未来的生活中,文化理论只能漂浮在空虚之中而难以找到停泊的港湾,寻找如何找回以往的文化信心和符号寄托,成为现代生活的大问题。然而,“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①马克思所描述的现象在法国大革命中多次上演。符号和话语的构建不应是拙劣的模仿,但真正的符号系统和话语体系代表着真实社会关系系统,那些偶然发生的事件和无规则形式只是话语规律之下的特殊表现。

二、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的同构要素

用词选择不当或者话语偏失,都会影响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的实际功效。恩格斯在谈到狄慈根的手稿时说:“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通,……,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术语重复同样的东西。”^②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体的存在状况、行为方式、心理习惯以及其他一些表征人的行为的综合内容,都是经常性的要件;社会制度、法律规范等在规章和律令方面影响着文化符号,物质生活、技术要素、器物的发明和使用,是文化符号和语义变迁的基础环境。

1. 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包含的主客体关系。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构成马克思主义文化叙事的基础,尽管当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意义有不少异议,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生产形式强化了生产力基础上的革命话语,成为积蓄革命力量的政治动员形式。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方向,使无产阶级这个革命主体在资产阶级社会客体中发生了历史性影响。文化符号和文化话语的选择,不能脱离社会的主体力量和客体环境。同样,这些主体力量及客体环境的影响下,文化符号也不断地变化着。不论是反映大众观念的消费文化和流行文化,还是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在符号选择上都难以脱离现实社会中的认识水平。尽管一些人将大众文化归诸于平庸文化,而把上层建筑的诸多意识形态和艺术归诸于高雅文化,却都难以摆脱这些文化之间的必然联系,有关主体都试图用审美学的符号和语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对文化客体的认识程度和理解程度,影响着主体在符号创造中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2. 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的内在价值寄托。文化符号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很大,现代消费主义的崛起有不少是符号价值影响的结果,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符号隐含着地位象征,符号消费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潮流,阿迪达斯、耐克、麦当劳、肯德基等产品的符号意义大于物质意义,而背后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成为关注的主要内容,人们不再全力倾注于商品的自然价值,而是把目光放在能够体现自身地位和尊严的事项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从价值之物到符号之物,标志着人们审美观念和消费意志的变迁,对社会价值观构成不小的冲击,甚至一些虚妄的价值想象也在寄寓其中。马克思在批评格律恩时,曾说他使用了“一种经典的、美文学式的、意识形态语言”,而这种语言符号的价值寄托却很少。选择一种符号并不意味着一定能顺利表达某种思想,还要有一系列的配套解释工作和意义转化活动。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96页。

言是最常见的符号形式,很多文化内容是借助语言来表现的,但是,仅仅靠术语兜圈子,是难以完全表达文化的真意的。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体现了当下文化建设的价值寄托,它不仅是一个符号系统,更是一个实践过程,是对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做出的新界定。每一种语言文字都以独特的方式描述和划分,使生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的人能在学会这些语言文字时自然地接受它所表达的意义。

3. 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的存在环境。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语言和劳动构成文化符号的产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了解语言符号的条件性和关联性,就难以理解文化概念和文化理论的普遍性,也难以理解各种学科对象性方法论所形成的文化概念的具体性。文化作为社会行动和社会主体积累起来的经验,体现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机制,其内容总结和符号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社会的有机整体性。但是,语言所联系的文化形式,有其特定的社会特征及阶级属性,尽管处在同一个社会中,不同主体的文化语汇是不完全一样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俄语词汇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就是说,由于产生的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现了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新的社会观点、新的道德以及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发展,补充了一大批新的词和语;许多词和语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改变了意思;若干陈旧的词从词汇中消失了。”^①在那时,标志新社会制度变化的词汇是很多的,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文化革命、星期六义务劳动等。但是,语言的传统性和继承性也是不能忽视的,其关键是看语言符号为哪一个阶级服务,十月革命以前,俄语为资产阶级服务得很好,十月革命后,它为无产阶级服务得也很好,不能简单地以阶级性质划分语言性质。同样的语言素材被不同阶级使用时,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为文化和语言是两回事。在社会生活中,有不同性格、不同传统和不同生活方式规定的文化形式,也有不同服饰和饮食代表的艺术符号和娱乐符号,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也在寻找共同的交往语言,也希望感受共同的美好艺术,以及这些事项背后的共同道理。

三、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同构中的意义链接

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绝不是漫无目标和毫无寄托的造物,其中包含着人们认识和表达世界奥秘并显示自身主观判断和需要的方式。在认识过程和知识体系中,每一种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的生成,都是人类试图理解现实世界的一种尝试,“意义的里程碑”以“意义”为表示不断竖起,又以“意义”的过时而不断刷新。人作为“意义主体”,在现实的环境、既有的造物中进行着“意义行动”,通过行动的“意义化”“再意义化”创造力充满意义的符号体系。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中考察二者的意义链接,从中找到很多规律性的内容,用以指导当下的文化符号建构和话语体系结构,这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工作。

1. 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的原初意义。原始意义是指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产生的基础、创作的初衷和最初的内涵,这是符号创作和话语构建的起点。一种文化符号的产生,总是离不开具体环境,而且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认识水平密切联系。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符号比较简单,粗犷而古朴的形式是由当时的简单生活决定的,所指涉的内容比较单一,它所构成的语符意义比较单纯。人类早期的物物交换很简单,包含符号意义或价值寄托都很直白,所表达的基本上都是原始层面上的意义。至于文字,最初也是一些简单的笔画,无论是象形文字还是楔形文字,意义都很直白。文字符号产生的初衷在于为记载事项提供工具,根本谈不上系统的学习。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抹杀原始符号的历史地位和功

^①《斯大林文选》,第522页。

绩,事实上,很多原始符号在历史和思想的变迁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繁衍出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新形式。物物交换到商品交换再到今天的景观社会,原始交换符号到纸币形式,都记载着人类生活的变迁和思想认识的变化。这个历史也是文化符号进化的历史。历史在变化,记载历史的符号和表现力上的话语也在变化。

2. 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的象征意义。文化符号和话语总是要代表一定的意义,这是一种能量蓄势和价值显现方式,那些“存在之巨链”上的文化符号均有其象征和指称。卜辞通过一系列的寓意符号把自然力量神格化,如:甲骨文中的令风、令雨、降祸、受年等,皇帝具备主宰一切的权威,成为超自然和超人间的力量。殷人敬鬼神所使用的符号系统也是一种观念表达,并延伸到日月星辰、山川木石等,于是有了“祭日东方”“祭月西方”“宁于四方”等卦辞符号。卜辞表达了对祖灵观念和王权观念的认同和结合状况。对祖先的重视和对后代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亲属联络、血缘凝聚和文化认同,其载体或活动方式是墓葬、宗庙、祠堂和祭祀。卜辞的文字符号也被认为是沟通天地、对话先人的话语要求和活动规范。记载思想史的汉字符号,是中华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的体现,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形成了一套象形材料,更在于绵延不绝的思想脉络构建,“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在思想上的分类,在古代中国不仅常常可以通过联想、借助隐喻,然后由表示同类意义的意符系连起一批汉字。也常常可以由一个汉字内涵延伸贯穿起一连串的意义,使他们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神秘的联系。”^①汉字作为思维的产物以及思维运算的符号,其最明显的变化趋势体现在语法规则程度上,这方面规范和修补受到共同的生活习惯和心理习惯的影响。

3. 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的指称意义。语言代码可以为文化传播提供纽带,表征着人们感知的现实,在一个民族或国度里,语言是在一定的心理、一定的习惯和一定活动环境中起作用的桥梁,它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着自己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内涵。在技术交流中,符号中介更是不可缺少,不仅代表古典文化的各类学科需要符号表达,显示现代技术发展潮流的现代科学成果更需要一系列的符号来表达。“借语言的发展与不断丰富而得到了异常坚强的社会的结合力,及社会本能(行动)以得到极大的增进与更加自觉。语言的放大又造成另外一种结果:促进人更容易地获得知识,并将其传给后代。语言的放大引起了科学的发达,以科学的发达而征服自然界。这样就使得人类开始能战胜自然界,才能骄傲独立,不为外势力所牵制而发生自由意志的观念。”^②生活中流淌着多种形式的语言和符码,这些符号的巨大魅力在于通过一定的形式创造成为社会意义的对象化载体。鲍德里亚研究了符号的“暗指”和“意指”及其作用,意指是在传统交换逻辑层面上运用的“价值的语言和符号的确定性的语言”,暗指是用一种“隐喻”式的语言或话语来传达意义。话语符号的意义链接与物体及环境有关,一切物事都可能成为话语素材或场景,话语内涵与场景存在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4. 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的引领意义。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已经产生,就对国家、社会 and 个人的形式产生引领做作,影响大小取决于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蕴含的实际意义。在宏观层面上,“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等影响着世界发展潮流,任何国家都不能无视这个大环境和背景,追赶世界潮流就成了具有引领意义的理念。在中观层面上,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对社会发展具有引领意义,促使社会顺着有关符号和话语所指的内容和要求来行动,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理想等,是具有明确导向的符号和话语形式;“四个全面”“五位一体文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也都是引领社会行为的符号和话语。在微观层面上,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人,时时刻刻生活在符号之中并受现实话语的

^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②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上海:新文化书社,1926年,第103页。

影响,精英文化的思想引领作用、大众文化的形式导向作用,流行文化的时尚引领作用,都是以一定的符号形式和话语形式对人们产生影响。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的引领包括形式引领、价值引领、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最具实践意义和引领作用的符号形式,它的话语内容、意义结构和引领作用,激励着中华民族和广大群众为之奋斗。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的引领力量,由自身的感染力、渗透力、影响力决定,我们提出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符号形式和话语样式,使之能够真正打动人心、入脑入心、增强信心,使之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失语、失声、失踪、失魂的现象。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的同构形式

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创造性活动,造就了一个复杂的符号系统,其中,语言、文字、标记、图片等成了主要的材料或载体,在社会的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充斥着不同类型的文化符号。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建设文化的认识,有着独特的思路和逻辑,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要突出个性与特色、突出继承和创新、突出长远和未来。

1. 站在人类全景高度上构建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文化创造不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情,而是人类生活中共同关注的事项,因为它不仅是当下思想和实践的寄托,也饱含对未来发展的期待。马克思认为,不论是从狭义的文化还是从广义的文化内容看,市民社会不仅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法的关系和国家关系都是用这种话语叙事来诠释的,这样的语境中,这种文化符号以法的形式寄托在市民心中,包含着人类解放的文化追求。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文化话语的另一基础,因为异化不仅表现在物质上,也表现在精神上,论证人的文化水平提高与消除社会异化的关系是马克思关注的一个重点。这个文化体系的基本逻辑是:劳动体现人类本质,但是劳动在其发展中逐步被异化了,消除这种异化的文化形态要实行共产主义文化。那时候,“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如果从文化符号的发展来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也会具备更多的共性特征,除了意识形态的刚性边界以外,那些可以成为多民族公用的文化内容,会有更多的话语空间;如果将这种文化叙事的物质基础再向前推,就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提升文化符号的真理性 and 话语表述的科学性。这一思维中的符号建构有助于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有助于在全球意义上理解人的发展的阶段性和上升性,有助于克服乌托邦式的文化遐想和镜花水月式的文化陶醉。“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②站在人类全景高度上构建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是体现人类文化关怀的重要方式,我们经常将物质关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把精神作为提升境界的基础,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都有自己的符合形式和价值关怀,是与时代相伴生的永恒主题。

2. 站在思想信仰高度上构建符号体系和话语体系。文化符号及话语体系绝不是毫无寄托的独白,绝不是纯粹的自我欣赏,而是利益和价值的真实表达。作为政治取向的符号和话语,没有思想寄托的文化符号也没有价值,我们的符号选择和话语构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活动,这是体现思想高地和捍卫文化阵地的基本保证。作为生活意义的符号和话语,缺少价值引领是不行的,社会主义核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心价值观本身就是一个符号体系和意义建构,是汇聚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的重要保障。作为学术意义的符号和话语,学术方面、学术目标都不能偏离正确的思想方向,无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良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都难以承担起新时代的话语建设任务。“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它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①我们的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要凸显文化的自信品格、陶冶功能、涵养功能、调节功能,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作用,使思想和实际相协调,理论与实践相协调。我们的文化符号构建和话语体系表达是一个整体性的过程,它的思想实质在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构筑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高地,这是融精神信仰、价值追求、人的行动于一体的创造要求。

3. 站在生活实践高度上构建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日常生活中的符号创造是具有多样性的,语言表达也最具有生活气息,它可以将抽象的难懂的理论通过朴实简洁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贴近群众的形式,也是最有效的形式,但也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或冒用。一些人出于不同的目的,采用话语符号歪曲事实、瓦解真相,或过度夸饰,或极力贬损,在名利的追求中将不良心态、不良价值撒播社会之中。历史虚无主义就生活在虚构的符号体系和话语氛围中,用虚构的符号诠释异端的想法,把人们的思路引向否定历史的道路,它用虚构的话语把人们的认识引向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意识上,它用思维自由和创作自由的借口,将文化发展引向不良路径,用歪理邪说来蛊惑人心。符号错乱造成了思想混乱,话语偏失造成了语义误导。面对这种现象,要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要让马克思讲中国话,让大专家讲家常话”^②。正常情况下,符号选择注重简化文本和转化文本,以便提高可读性和可识性,使不同阶层的人具有一致的解读效果。恰当的文化符号有助于价值观的维护和宣传,它用严肃的语言为价值观辩护,显示出明确的思想意向,符码的调整和置换都是为了适应这种意向。不同文化符号提供了表达不同价值内涵的工具材料,而价值观提供了符号表达所需要的修辞材料,人们在这种双向选择中构建着社会的意义系统。文化符号可以比较深奥,也可以比较浅显,那些以小见大、以近明远、由此及彼、由浅入深的符号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辐射功能。尽管文化符号的选择通常要“建构”或“解构”对象内容,但“解构”和“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编造,更意味着可以割裂事实,“解构”要有利于认识话语本质,“建构”意味着要有利于体现真意,不能忽视话语场景和实际环境,不能忽视意义连贯和完整表述,更不能“口不应心”,要用合适的符号和话语“辨其实”“殊其名”“宣其志”“立其称”,客观真实地表达当下的文化精神。

4. 站在融合创新高度上构建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技术时代的符号和话语最具变动性和灵活性,技术工具也提供了增强符号魅力和话语感染力的工具。符号运用和话语选择,可以是虚实结合的,可以是形神兼备的,可以是雅俗共赏的,技术手段会给这些方面增添更多的创新内容。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的语言素材差别很大,对这些材料抽象的方式、方法有很大差别,技术背景的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也有很多变化。很显然,手推磨时代的语汇、蒸汽机时代的语汇、电气化时代的语汇、大数据时代的语汇,各有自身的时代特色又会影响后来的符号发展,因袭前人固然不行,推倒重来也不科学,运用现代技术进行科学创新是一个基本思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创新要体现以下方面的要求:不能用技术性替代思想性,运用技术进行符号表达和话语创新时,不能忽视思想和技术的结合方式,运用技术符号寄托思想意义不是运用技术遮蔽思想内容;不能用技术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00页。

掩盖政治性,我们的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不是无主题的空头文字,运用技术进行符号表达和话语创新时,要注意技术的政治隐喻功能,片面强调技术的专家和精英符号,与片面强调技术阴影的技术恐怖论思想,也无法合理体现技术的媒介功能;不能用技术的自由性代替生活的民主性,技术推动了自由观念的发展,但是技术意义上的民主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技术影响下的语符对于发挥人民自由想象是一个激励,但并不意味着完全意义上的政治进步;不能用技术进步代替人的进步,技术进步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还不是人类社会所关注的全部内容,技术时代的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不等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话语要求。站在融合创新高度上构建文化符号和话语体系,要贴近世界发展潮流、社会发展愿望、人的发展内涵。

(责任编辑:蒋永华)

Analyzing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Cultural Symbols and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MENG Xian-ping

Abstract: Cultural symbols provide different ways of understanding space and time and a tool for formulating questions. New narrative strategies provided by social practice inject new impetu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symbols. Cultural symbols and discourse system have their own logic of construction, the ideal state of which is that one is isomorphic with the other in form, coherent in expression and consistent in meaning. To be specific, they are isomorphic with each other in such aspects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inner values and the way of making signification. Their original meaning, referential meaning, symbolic meaning and guiding function often vary with the context and environ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discourse system should be guided by advanced thoughts, conducted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based on life practice, and realized by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and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Marxist context is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is to say, such notions as “cultural soft powe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all have specific symbolic value and discursive denotation.

Key words: Marxism; cultural symbols; discourse system; isomorphism